

科技與身體[#]

廖朝陽*

在人文學領域，「前瞻議題」在觀念上的定位（以及應用價值）恐怕並非毫無爭議。這裡我們可以先以「前瞻」觀念所涉及科技與身體為例。如果「科技」是理性知識的應用，那麼「前瞻」涉及研究者對學術環境趨向的判斷，也就是（可能取代本身興趣或自主性的）理性知識，以及此類判斷的應用（提升未來研究成果的價值，應該也具有科技的性質）。這裡的程序有點像古老的「性格即命運」：透過前瞻性的理性判斷，研究者希望消除本身研究「性格」的盲點，參與決定未來的命運。但是正如班雅民早就指出，不論是性格（過去表現）還是命運（未來的發展）都涉及徵兆的解讀（Benjamin 1996b: 201）。即使是已經有事實呈現的「性格」都已經是各種徵兆的綜合判斷，遑論是尚未成形的未來走向？這就是「前瞻」的矛盾性所在：追根究底，前瞻的效力只能建立在「後瞻」上，或者說前瞻的前向性只有回到過去的文化記憶才能想像。

本文要討論的主要當然不是前瞻性的觀念，而是文學研究與科技、身體的關係，特別是科技、身體這兩大議題如何在相關論述中合流。這裡把前瞻的觀念連結到命運、性格，用意不僅在呈現文學研究在研究技術高度發展的時代仍然保有某些通常不會被注意到的資源（命運、性格的考慮指向龐大的敘事文學傳統），同時更希望點出在這個時代（或者說在我們所處的，因為尚未結束目前尚在持續成為過去，並因此而具有未來性的時代），文學與科技、身體的連結（嚴格來說，我們只能看到過去的連結）如何涉及更大的前瞻性（有些人會認為與人類未來的命運有關）。

一、人與物的分裂

前瞻議題的探討與使用也是一種（研究）技術。人文學者通常對熱門議

[#] 本文部份內容為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計畫案支持之研究成果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題、前瞻議題的觀念會持較懷疑的態度，因為人文學研究重視特殊環境的特殊經驗，偏向以個體或特定群體內在的獨特性為價值基礎，是否能引用原本屬於科學或科技領域的，高度工具化、高度化約的技術原則頗有疑問。另一方面，這樣的區分已經假設了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遵循不同的原則，甚至無法溝通。就西方文學傳統來說，這是工業革命以來知識分裂的結果，卻也是現代性無法避免的預設，建立在現代性知識觀所設立的，人與物（主要是機器）的分裂上面。在習見的觀點背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知識分工的隔閡，更是貫穿現代文化整體的裂痕，而就西方文化來說，這卻也代表一種無法解除吸引力的創傷，會以類似症狀的方式，在正反折衝的不確定性所在不斷引發演練動作。也就是說，西方現代性會以各種的方式，透過文化想像來重演人與物的對抗或相遇（見 Daly 2004）。從《科學怪人》(*Frankenstein*)的工業志異到《AI：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虐殺機器人想像到《超速性追緝》(*Crash*)的機器性欲，文學，電影史上可以找到許多這類補償性演練的例子。

人文知識雖然是在超越的論述層次運作，卻也不能免於同樣的演練機制。在這個論述層次，現代人文與科技的關係在 1959 年因為英國文化界一場「兩個文化」的辯論而引起注目，成為持續影響西方文化傳統的重要事件。但是在兼具科學家、小說家身分的史諾提出人文與科學兩種文化的分離（見 Snow 1998）之前，人文對科技的抗拒早已具有文化延續性。十八世紀後半以來西歐浪漫主義思想常常表達對抗工業化、市場體制、技術理性的立場，明確程度雖然不一，但可以視為一個獨特的「世界觀」（Löwy and Sayre 2001: 20f）。人的非人化、科技的盲目發展、對機器的崇拜不斷成為追求神祕觀點、無限創造力、有機形式的理由。十八世紀末的席勒不滿普遍存在的「平庸、粗糙的機械體」，認為新興世界會造成國家秩序脫離個體需求，「結果就是：具體、個別的生命被抹煞了，為的是要讓抽象的整體觀念維持它的可悲存在」（Schiller 1967: 35, 37）。十九世紀的卡萊爾批評當時的時代是「機械時代」，因為沒有人直接（以手工）生產事物，「什麼都要靠規則，靠精密計算的裝置」（Carlyle 1984: 34）。

不管是在哪一個時期，抗拒當然都不可能是人文如何看待科技的唯一論述，但是整體而言，「兩種文化」的分離的確可以視為決定各種論述可能的基本元素。例如浪漫主義論述到了二十世紀經過變形，被轉用到結合科技與意

志高度的訴求，成為法西斯思想興起的重要元素之一（Löwy and Sayre 2001: 32, 66-69; Herf 1986: 8f, 30-34; Malpus 2005: 281），其中的複雜關係涉及文明自毀的重大關節，卻又難以理清。另一方面，只要現代性仍在延續，我們似乎不可避免的也會繼承浪漫主義思想的若干面向，至少在面對科技或工具理性議題時無法脫離它所訂下的框架。以文學批評來說，2000年出版的論文集《機器複製時代的吳爾芙》（Caughie 2000）是一個指標性的案例。一方面，這個論文集代表吳爾芙批評的重要轉折，由早期的美學、敘述形式討論以及後來的身分、書寫政治轉向當代科技與感知結構的關係。另一方面，這個轉折並未脫離「兩種文化」分分合合的再次演練，其中或許也顯示新的方向，但並未涉及根本架構的變化。

二、班雅民對浪漫主義的檢討

進一步看，《機器複製時代的吳爾芙》也以另一種方式顯示了來自過去的前瞻性。許多人認為班雅民的許多看法到了二十一世紀仍然極具啟發性，《機器複製時代的吳爾芙》正是典出班氏的名作〈機器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Benjamin 2002），在其思考框架下設定研究議題。班雅民本身當然也是浪漫主義思想的一種批判性延續，但是他所開啓的是直到近年才明確進入文化辯論的另一種可能。在〈機器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他點出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美學化」，在當時已經是如火如荼進行中的現象，雖然也是晚近納粹美學論述的重要資源（Herf 1986: 230），到底還不算特別具有前瞻性，但我們也必須考慮：在納粹勢力尚在醞釀時，他早已在1920年前後論述德國浪漫主義的文字中指出其中的「神話」面向。在意義來自神啓的時代，文學裡的象徵表達可以結合救贖的理想，調和自然歷史的殘酷，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後，人類活在失去神啓意義的情境裡，人文與自然分離，寓言體反而比較適合用來彰顯人在自然摧殘下呈現的「死亡面相」（Benjamin 1977: 163-67）。當時的浪漫主義文學觀堅持象徵體相對於寓言體的優越性，等於是用美感的表相來遮掩新歷史階段的事實。班雅民評論歌德的小說《自主連結》（*Elective Affinities*），極力主張女主角面對死亡宿命的「美」只是表相，原因也是因為小說世界裡的生活已經失去自然與超自然合一的生命形式，落入充滿罪惡感的「準生命」（mere life），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所以象徵式美感在其中並不能發揮作用，反而只是故作神祕，只能遮掩真相（1996c: 308）。

浪漫主義起於重視個人獨特性的觀點，特別標舉靈魂與身體的直接關連（「感覺、想像與意志」），據以對抗抽象的理性觀（Niebuhr 1996: 82）。通常靈魂與身體的關連主要是表現在人的內在性（有機生命體的內外區隔），例如說機械時代工具理性入侵的是一個「內在、動態的領域」，涉及「人的主要內在能力」等（Carlyle 1984: 46, 42）。班雅民提出「準生命」的說法（指的是自然生命失去生命當中大於生命的一部分而產生罪惡感），明確將身體的特殊定位帶入浪漫主義內在性想像的議題中，也成立了科技與身體必須放在一起討論的「大」前瞻框架。另一方面，浪漫主義提升靈魂的追求既然註定無法喚回超自然的層次，班雅民必須另尋出路，由仰求超越轉向側向移動，也就是回復身體的橫向關係，消解孤立身體與罪惡感的結合。這樣一來，身體與物體的物質聯繫就成為重建生命意義的重要基礎。這部分其實也是來自浪漫主義的一些元素，如諾華利斯（Novalis）的自然哲學、歌德的自然觀察（Hodge 2005: 22f）。這樣的聯繫並不是利用、榨取式的抽象技術，而是建立在內在性上面的「參與式」模仿關係：「如果我們有能力認識萬物，那是因為萬物有能力模仿我們」（Bracken 2002: 327; 參見 Benjamin 1996a: 144ff）。

三、模仿與抗拒

班雅民的思想進路描繪出浪漫主義的重要轉化，其中隱藏的論述可能性直到今天仍然在引發新的辯論。一方面，身體與物體相互參與的原則代表生活方式、藝術媒材的改變會改變感官經驗的樣態，藝術或有關藝術的知識如何正確的「模仿」媒材技術的改變因此成為重要的議題。〈機器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揭示了早期影像技術發展與藝術表達的關係。晚近數位記錄、網路文化、生命科技快速發展，引發了無數「人工複製時代的機器生命」、「數位複製時代的人聲藝術」、「電腦（再）生產時代的藝術作品」、「生命控制時代的藝術作品」、「數位變化時代的理論寫作」等等「模仿」，具體呈現了前瞻事件與後瞻序列之間不斷繁衍、回復的物質關係。另一方面，側向移動成為唯一選擇，也開啓了各種去除移動障礙（各種「神話」、「美感」的超越迷惑），確立身體與環境自主連結能力的文化動能。即使在後結構派權力論述、文字中心論述影響最深的年代，〈機器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也能快速成為「熱門」文獻，原因正是在其背後帶有重要的歷史延續，能持續指向人與物互相吸引、互相模仿的可能。

我們可以看一下近年來的身體論述如何進入科技議題。身體與科技的關係成爲重要議題，主要是與女性主義論述對西方文化理性主體的批判有關，這裡不能詳述。到了哈洛威的〈半人宣言〉(Haraway 1991a) 出現，成爲另一個「熱門」文獻，使抽象論述具體化，以身體與物質的橫向連結來突顯世界的創新來自「即身性」(embodiment)。就哈洛威而言，不論是「半人」的主張（認爲人與機器、生物與非生物拼裝是生存的常態）還是後來轉向物種共生的關懷，都建立在知識的情境關連上：只有與情境接合，接受知識對象也是動作者，知識才能取得現實效力 (1991b: 197-201)。這樣的論述方向來自科學本身的反省，卻也符合班雅民架構在神學上的、身體與物體必須相互參與的觀點。

哈洛威代表的女性主義立場強調行動能力，與班雅民著重語言、人文意義的路線自然有其差異，但即身性設立內在世界的優位性，也顯示出身體與外在知識如何達成橫向接合，仍然是尚未解決的問題。這一點在後來海爾思 (Hayles 1998) 將即身性的主張應用在後人類論述時已經表現得很清楚。海爾思檢討後人類理論發展，特別強調資訊科技高度發展所造成的去身體傾向（人類意識可以脫離形體，上載、下載到他處），極力要以後人類理論本身的發展來說明即身經驗的不可忽視。但是她的「即身性」意義似乎頗廣，也可以包括無生命物質，例如書寫媒材（外在技術）不僅可以「參與」意義，而且似乎可以取代身體的行動，甚至將身體當成複製自己的媒材，透過動作訓練將外在程序內化爲自動反應，而且不離開即身行動的架構。另一方面，海爾思又常透過敘事情境的有無來界定即身性，例如她將整個自動控制學的歷史進程描述爲一個有情節發展的「故事」，就是要突顯自動控制學是具體情境中發展起來的，具有生命經驗基礎的論述，其中主要論述者的思想立場除了極抽象的理性思考外，都各有其「故事」，各有其私人的、情緒化或者高度受到情境影響的面向。也就是說，生命經驗的外在顯現（由各種徵象建構起來的故事）進入抽象論述，因爲是與身體內在性的連結而產生對外在知識的抗拒，是即身性的另一種操作形式。

這裡的問題顯然是在第二種即身性指向抗拒的必要（因爲體制化的知識可能含有美學虛構的「神話」，未必是物質世界的正確表達），第一種即身性卻比較像是盲目的模仿。其實由後來影像媒材的發展看，〈機器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提出的預測多半沒有實現，但是班雅民的主張本來就不是「跟

著媒材走」，而是就隱藏在媒材技術中的真實，不斷抗拒體制的神話編造，維持知識技術與身體的連結可能。

四、新的論述可能

既不能放棄抗拒，又必須維持橫向連結的可能。如何判斷模仿與抗拒的分際，就是班雅民留下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裡的不確定性本來就不可能或不必要完全消除。班雅民談《自主連結》的另一個講法是：只有面對不確定性才有決斷，只有決斷存在才有自由。如果只有完全抗拒與盲目接受的固定選擇，就不能破除神話設立的表相，因應不斷在演變的現實情境。

雖然不必有固定選擇，在不確定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路線。首先，韓森在 2004 年發表《新媒材的新哲學》一書 (Hansen 2004)，延續哈洛威、海爾思對即身性的追求，並以媒材發展為主要參照，進行了更深入的論述。這個路線強調即身，當然是在內外連結的預設中特別偏向維持內在性，抗拒體制化技術的部分，希望以實踐層次的現實感來提升具體行動的能力。韓森認為影像電子化並不代表物質抽象化、資訊化，而是指向影像的程序性，也就是必須預設電子訊號要靠身體知覺的參與來完成。這就是伯格森 (Henri Bergson) 所謂的「未決定中心」(center of indetermination)。以未決定為中心，表示身體是創造力的發動者，保有抗拒外在秩序的力量。與浪漫主義不同的是，這裡的創造力是建立在內外連結上面，所以即身性已經含有部分離身 (disembodiment) 的傾向：如果已經內化的身體習慣遭遇新技術的衝擊，身體本身會透過自感 (affectivity) 來進行重新創造 (2004: 7)。

韓森的立場明確以哲學家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對伯格森的解讀為「抗拒」對象，因為德勒茲的解讀 (特別是 Deleuze 1986) 將虛擬創造的核心擺在外在技術上，等於是肯定了離身性的優位。如此一來，哈洛威、海爾思、韓森似乎形成一個科技與身體聯合陣線，對抗德勒茲的反身體哲學觀點。在科技論述的領域，德勒茲本來不乏盟友。不過就即身、離身的議題來說，德勒茲的路線要到最近才出現比較明確偏向離身的申論，具體成立兩種路線分立的態勢。這就是江士敦的近著《人工生命的誘惑》(Johnston 2008)。

江士敦以人工生命為主軸，補充了海爾思的後人類論述，並以專章引用德勒茲思想，認為在變動不居的物質背後，另有一種假想的「抽象機器」在

決定各種機器組合的解管領 (deterritorializing)、再管領 (reterritorializing)，而人工生命所以能擴大生命的定義，就是因為抽象機器的運作成立了技術上的可計算性 (computability)。必須指出的是，江士敦的立場並不是回到傳統的「去身體」傾向，以抽象的資訊法則來確保規範的存在，因為可計算性如果可以不離開物質，那麼即身、離身的區分就不是絕對優位的選擇而比較像是聚焦點位置的相對移動（這是離身與「去身體」的不同）。抽象機器的說法肯定了可計算性雖然可以抽離某一（常識）層次的物質，卻仍然停留在物質的另一（科技）層次，而且反而是如此才能確保後人類（廣義的機器）可以拆解重組，不會再度落入以合形 (molar) 個體為單位的單一、巨大靈魂觀點，也就是說，可計算性正是後人類即身性的基礎。

這樣的路線差異其實可能只涉及即身中有離身、離身中有即身的分別，看來似乎不是無可調和。但就未來的發展來看，這裡比較重要的應該是差異中表現出來的不確定性或理論決斷的可能。出身解構派的哲學家史提格勒 (Stiegler 1998, 2009) 用「誰」與「什麼」來代替身體與科技，認為人類主體（「誰」）本來就沒有特殊內容，所有經驗的特殊性都是來自身體內部與外部（兩者都是「什麼」）的應接過程，同時經驗一旦需要累積，就必須脫離身體內部，進入較持久的「第三保存」（外部媒材的記錄），而外部技術容易體制化，也必須體制化才能保持穩定，所以人類總是脫離不了必須在體制化技術中尋求特殊變化來因應個體特殊需求的兩難。

史提格勒的提法似乎消去了即身與離身的分別（人與物不可能脫離模仿關係），又似乎保留了兩種路線的距離（模仿中必須留下抗拒的空間），具體標示出論述的難點所在。由各種跡象觀察，身體如何以橫向連結的方式來面對愈來愈快速的科技演變，如何在知識不斷體制化的情境中判斷真實與表相，仍將是未來研究者持續探討的重要議題。

引用文獻

- Benjamin, Walter. 1977.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London: NLB.
- .1996a. “The Concept of Criticism in German Romanticism” (1920). Trans. David Lachterman.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1913-1926. Ed.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16-200.
- .1996b. “Fate and Character” (1921). Trans. Edmund Jephcott.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1913-1926. Ed.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201-06.

- .1996c. “Goethe’s Elective Affinities” (1924-25). Trans. Stanley Corgold.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1913-1926. Ed.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297-360.
- .2002.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Reproducibility.” 2nd version. Trans. Edmund Jephcott and Harry Zohn. *Selected Writings*. Vol. 3, 1935-1938. Ed.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01-33.
- Bracken, Christopher. 2002. “The Language of Things: Walter Benjamin’s Primitive Thought.” *Semiotica* 138: 321-49.
- Carlyle, Thomas. 1984. “Signs of the Times” (1829). *A Carlyle Reader*. Ed. G. B. Tenny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31-54.
- Caughie, Pamela L., ed. 2000. *Virginia Woolf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New York: Garland.
- Daly, Nicholas. 2004. *Literature,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1860-2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Deleuze, Gilles. 1986. *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 (1983).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 Hansen, B. N. Mark. 2004. *New Philosophy for New Media*. Cambridge: MIT Press.
- Haraway, Donna. 1991a.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49-81.
- .1991b. “Situated Knowledge.”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83-201
- Hayles, N. Katherine. 1999.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 Herf, Jeffrey. 1986. *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
- Hodge, Joanna. 2005. “The Timing of Elective Affinity: Walter Benjamin’s Strong Aesthetics.” In Andrew Benjamin, ed. *Walter Benjamin and Art*. London: Continuum. 14-31.
- Johnston, John (2008). *The Allure of Machinic Life: Cybernetics, Artificial Life, and the New AI*. Cambridge: MIT Press.
- Löwy, Michael, and Robert Sayre. 2001. *Romanticism against the Tide of Modernity*. Trans. Catherine Porter. Durham: Duke Univ. Press.
- Malpas, Jeff. 2005. “Retrieving Truth: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Victor E. Taylor and Gregg Lambert, eds. *Jean-François Lyotard: 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 Vol. 3: *Ethics*. London: Routledge. 279-94.
- Niebuhr, Reinhold. 1996.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A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2 vols. Vol 1: *Human Nature* (1941).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 Schiller, Friedrich. 1967.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ies of Letters* [1795]. Trans. Elizabeth M. Wilkinson and L. A. Willoughby. Oxford: Clarendon.
- Snow, C. P. 1998. *The Two Cultures* (1959, 196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Stiegler, Bernard. 1998.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1994).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 .2009. *Technics and Time, 2: Disorientation* (1996). Trans.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